第一章
日本侵华策略的改 变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在对华策略上改变了以往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而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日本在策略上的新修改，并不意味着它对国民党军事压力的放松。它凭借其空中优势，选择了对以重庆为主要目标的中国城市进行轰炸的战略手段。日本多次发布指令，命令陆海军航空部队以狂轰滥炸打击中国政治、军事中枢，妄图以此摧毁陪都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灭亡中国的目的。由于国民政府和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轰炸斗争，日本的这一残暴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一、日本侵华方针的新变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日本速决亡华计划的破产〕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争之初，日军作战部门中盛行着“对华一击论”，认为只要大军一出，就可以速决亡华。特别是他们轻取平津以后，被暂时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中国丧失了长期抗战的自信，遂制订了扩大侵略战争的计划，把矛头指向中国经济、政治中心——上海、南京。日本陆相杉山元报奏天皇说，只要大日本皇军陈兵沪、宁，“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生存就不能超过三个月。”狂妄地认为3个月就可以摧毁中国的全部抵抗力量。但是，战争的进程没按侵略者的意愿发展。侵华战争从发动的那天起，就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仅淞沪一战，中国军队就坚持了3个月之久，日本付出死伤5万多人的沉重代价才占了上海。日军3个月灭华的梦想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欣喜若狂，以为这是“中国事变”的终点。1938年1月,日本发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企图扶植傀儡政权，“以华治华”。但是，南京虽然陷落，中国政府并没有屈服，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继续抵抗，战争已愈显长期化趋势，日本当局也感到要征服中国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同年6月，在日军占领徐州后，日本五相会议认为：“中国事变虽因徐州陷落，已见战局之一大进展，唯其前途尚辽辽。’① 因此，日本政府决定“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大概以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② 日本军部倾其主力，集中侵华部队的陆、海、空军向华中、华南大举进攻，把赌注下在攻占武汉、广州等地上，以期在1938年内结束战争。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1分册第94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1分册第94页。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广州。经过15个月多的激战，日军虽然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和平汉、粤汉铁路以东部分地区，但是，中国的抵抗能力并未被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更加坚强。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是主动撤离武汉的， 100多万中国正规军队驻扎在武汉外围的鄂、皖、豫、赣之主要地区。武汉的东南边有第三战区的22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东北边是第五战区的26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其他特种部队；南边有第九战区的52个步兵师以及特种部队和游击队。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也没有动摇。在武汉失守后两天，10月28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而且，他指出，武汉保卫战之目的在于：

> “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西北之建设。又说，我中部工业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具初步基础。”①

武汉保卫战振奋了民族自信心，锻炼了军队的攻防能力，又有以“天府之国”四川省为首的西南西北潜力无限的后方基地作依托，为长期抗战打下了基础。

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猛烈开展，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 2万多人，先后创立了华北的晋察冀，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鲁西南、冀鲁边、山东，

①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二）第351页。

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11月，八路军三大主力又由原山西山区分别向河北和山东平原地区挺进，在冀南、冀中、冀鲁豫边区和山东等地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新的局面。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消耗和牵制着日本大量兵力，并同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对侵略者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这种情形使日本最高军政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汉口之陷落并非事变之终点。”因此，在发出《关于攻陷武汉后国民活动的通知》中提出：“要避免召开使人感到事变结束的战胜庆祝会”，而是要“宣扬应付新阶段的精神准备。’① 事实上，一年多的战争大量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到1938年底，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陆续投入了23个师团、16个旅团（不含东北的关东军），共计近百万人的兵力，占其陆军总数的2/3以上，在日本本土只剩下近卫师团了，战争中伤亡已达44.7万多人。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保守占领地的兵力又大量增加，日本当局感到“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② 日本国内的经济形势也出现困难，连日本军方也认识到：“如再扩大战区或增派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随时可能“陷入因暂时的财政破产而不得不改变对华方计的窘境。’③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坚持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的前提下，不得不对侵华政策作一些调整。

〔软硬兼施的侵华新方针〕

日军大本营早在进攻武汉以前就对占领武汉后的对华政策作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2分册第35页。

②《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③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1分册第96～97页。

了两手准备。1938年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作出决定，对华中、华南积极进攻，“让敌人连战皆败，特别是中原地区的陷落，将引起中国中央政府自行崩溃和放弃继续抵抗的意志。”重庆国民政府屈服时，“帝国将其作为一个政权……使其合并于新兴中国中央政权(傀儡政权——笔者注)之下”若“仍不投降时，帝国今后不用直接急于用武力解决事变，主要运用政策和策略更加促进新中央政权的扩大和加强。同时，在政治、外交、经济、思想上逐渐压迫中国现中央政府，促使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毁灭。”①在此已显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改变原来对国民党政府及军队采取的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政策的端倪。占领武汉后，日本当局深感结束“中国事变”前途难料，继续进攻重庆又力不从心，便进一步确定了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同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笔者注),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② 明确否定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以共同反共防共为诱饵，对国民政府进行分化、诱降，要国民党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华中派遣军认为，战争进行到目前的形势下“进行政略尤其是谋略的重要性更加大了。”③ 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制定的“对华处理方略”明确规定，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应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10分册第96～97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2分册第68页

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2分册第54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运用谋略和政略。’①同月，日本政府设立“兴亚院”，由内阁首相兼任总裁，统一筹划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事务。日本政府企图用“政略”、“谋略”以及外交各种手段引诱国民党投降反共，促进国民政府的屈服，从而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与政治策略变化相适应，军事上，日本侵略者停止从陆地上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和切断我国西南、西北两条国际交通线为主的方计，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重点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但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诱降活动和继续打击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加强了对我国大后方的战略、政略轰炸。

1938年11月，日本陆军部制定的《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中提出：“要确保占领地，注意避免战局的扩大，但要积极进行航空作战，特别要在制压敌人的战略、政略中心的同时，尽力消灭敌人航空战斗力量。”② 12月 2 日，日本天皇向侵华日军下达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的“大陆令第241号”。敕令称‘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争取压制消灭残存的抗日势力。”命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主要担任华中及华北的制空进攻战，特别要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心。”从此，日军航空部队的作战重点由以前的协助地面部队改变为直接攻击中国大后方战略、政略要地，尤其是国民政府战时驻地——重庆。

二、重庆是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重庆位于“天府之

①《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第459页。

②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 2卷 2 分册 第69页。

国”中，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为国家重镇。它地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其东、南、北三面有大巴山、巫山及云贵高原的大娄山环绕，又有长江三峡的急流险滩扼守东部门户。因此，重庆素有“天险”之称。乾隆简志云：“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故渝城能守，坐安和会。”近代以来，重庆发展成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为西南物资集散地，加之物产丰富，水陆交通较为便利，具备了长期坚持抵御外敌的有利条件。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进攻中国。8月13日，上海战事发生；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接着，又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机关国防会议，颁发了总动员令，在全国范围开始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国防最高会议举行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会议接受蒋介石提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次日，国民政府接受国防最高会议的决定。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的战斗。”“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① 11月中旬，国民政府已着手部署迁驻重庆的工作。11月16日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首批抵渝。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随后，政府各院、部、会陆续迁至重庆。1938年

①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二)第211～212页。

10月，武汉陷落。12月，蒋介石率军委会辗转到了重庆，国民政府军事指挥中心也移到重庆。随着国民政府迁渝，战区的部分工业、教育机构、新闻文化单位、民间团体、外国驻华机构等纷纷汇集重庆，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教育的中心。

〔重庆成为抗战根据地〕

重庆是国共合作的新的重要政治舞台。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再度携手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之初，武汉是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驻武汉，就两党在政治、军事及其它方面的合作进行谈判磋商，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正是由于两党的团结、两个战场的相互支援和配合，才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对此，连我们的敌人也有清楚的认识。1938年5、6月间，日本国策研究团体“昭和研究会”在向内阁呈交的一份题为《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的文件中认为汉口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楔子”，“为了摧毁抗战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他们认为攻下武汉，抗日统一战线即会瓦解，抵抗力量就会被摧毁。然而，武汉虽被日军占领，我国的抗战力量却并没有被摧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没有破裂。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国共合作的舞台随之转移到重庆。1938年10月，日寇进逼武汉，中共驻武汉代表周恩来等和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报馆西迁重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也于此时成立。1939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在重庆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它负责领导以重庆为中心的国民党统治区及部分沦陷区中共党的工作。以后，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力量相继集中到了重庆。

重庆成了战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汇集的地方，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重要政治舞台。中共中央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国共合作，正确处理了和国民党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大力加强对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等爱国人士的工作，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使重庆成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重庆又是文人荟萃地和文化教育机构的集聚地。抗战爆发后，战区的一些高中等学校开始了向大后方的转移。截止1939年，迁往重庆的高等学校就有20所。其中，有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东吴大学、复旦大学、中华大学等著名学府。同时，战区的科学机构、新闻出版机构、文化团体也陆续迁来重庆。文化教育界人士汇集重庆，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促进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随着国统区政治中心的转移，国内经济中心也移到了重庆。上海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和工商界爱国人士组织沿海工业逐渐西迁。武汉失陷后，省外工厂纷纷迁入川内。到1940年，迁到川内的厂矿已达254家，复工厂矿达184家，迁川技工8105人。迁川民营厂矿90％以上均在重庆、巴县一带，迁渝工厂占了全部内迁工厂总数的1/3。军政部所属兵工厂矿有10个迁到重庆，运渝兵工器材10万吨。① 沿海工业内迁，大量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的集中，促进了重庆工业大发展。到1940年，逐渐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沿长江东起长寿、西至江津，沿嘉陵江北至合川，拥有钢铁、机械、造船、纺织、化工等门类较为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地带，成了“抗战时期工业的生命线”。

国民政府移至重庆后，政府所属的金融机构也迁移来渝，垄断全国金融事业的中中交农四行总行或总管理处和中信、邮汇局

① 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第531页。

都设在重庆。此外，还有外省的许多银行也相继迁入重庆。到1939年11月止，重庆共有银行30余家，已成为大后方的金融中心。同时，重庆人口的猛增促进了商业繁荣。到1941年，重庆有各类商号1.4万多家，成为大后方的商业中心。

重庆又是大后方的重要的交通枢纽。它控扼长江、嘉陵江，具有良好的水运条件。抗战爆发后，川江成为大后方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国民政府迁渝后，为了加强抗战运输的需要，又大力发展陆路和空中运输线。到1940年前后，有川黔、川湘、成渝、川滇、汉渝公路，沟通了西南、西北和华中地区的陆路交通。1938年，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相继迁渝，发展了重庆航空事业。截止1940年，中国航空公司开辟了渝港、渝蓉、渝宜、渝嘉、渝筑等6条国内航线；欧亚航空公司开辟了渝西（西安）、渝港、渝蓉等8条国内航线。此外，重庆至河内、重庆至仰光以及通达苏联阿拉木图和印度加尔各答的国际航线也已开通。这些航线的开通对于保证战时运输和与国际间的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自国民政府迁渝到1940年的3年间，重庆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已经形成。市政建设得到空前发展，其规模日益严整，其地位日益提高，成为中国抗战实力雄厚的后方基地。因此，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恢宏建置，民意佥同。兹特别定重庆为陪都。’① 重庆的陪都地位自此确定。

陪都重庆由于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成为日

①《新华日报》1940年9月7日

本侵略者空中进攻战的重点目标。日本侵略者认为，恐怖的轰炸势必造成大后方经济的破坏，促使人民厌战情绪增长，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从而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于是，日帝精心策划和部署了对重庆的空中进攻战，即对重庆进行大规模轰炸。

三、日军轰炸重庆的战略部署

〔通向战略轰炸的道路〕

日本陆海军是侵华战争的主要工具。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属于陆海军。为适应现代化战争和越洋远距离作战的需要，陆海军都特别注意发展航空部队，对外侵略扩张。

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确定扩充军备计划，即陆军航空兵142个中队，海军航空兵65个中队。①同年8月，陆军编成了航空兵团司令部，规定兵团司令由御任的陆军大将或中将统辖，是直接隶属天皇的飞行部队。10月，海军也拟编“特设航空部队”，以加强空中力量的建设。在大规模的扩军备战中，日本的飞机制造量不断上升，1931年年产量为410架,1937年上升到1580架。1937年5月，陆军省向政府提出的发展军工生产五年计划中，要求保持年产10000架飞机的设备能力，第一年生产10000架，第二年生产20000架。② 七·七’事变前，航空部队已拥有飞机2700架，③陆军航空兵团下辖第一、第二、第三3个飞行团和关东飞行集团（辖5个飞行联队）；④海军航空兵有陆上航空队37.5个中队，各类飞机400多架，舰载

①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556～55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②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第5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
③ 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页。
④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1卷1分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飞机180多架，共计600多架。①在这场空前的侵华战争中，日军航空部队一开始就充当了急先锋。

1937年7月11日，日本军方签订了《华北作战陆海军航空协定”，下达了由陆海空兵“摧毁华北方面之敌航空势力”、由海军航空兵“摧毁华中华南之敌航空势力”的任务。②据此，陆军航空部队于15日编成“临时航空兵团”，包括侦察机、战斗机，轻、重轰炸机等共18个中队，派往中国东北的山海关、锦州、大连等地区。③海军航空部队编成“特设航空队”，其配备是：在华北方面有第二联合航空队、第二十一航空队；在华中、华南方面有第一航空战队，第二航空战队，第一联合航空队，第十二、二十二航空队，“八·一三”后又增加了第二十三航空队。④在平津作战中，陆军航空部队便开始配合地面部队作战。日军在夺取平、津之后，侵略气焰嚣张。8月2日，参谋本部进一步策划扩大侵略计划，决定“断然进行华北会战……并对中国军队主力给予致命打击。”“应迅速对中国军队，特别是中央军中的空军，给予沉重的打击，使南京政府在失败感下不得已而屈服，并由此造成结束战局的机会，此点最为紧要。’⑤中国空军十分年轻,抗战爆发时,国民政府只空军有战斗机179架,侦察机148架,重、轻轰炸机99架，飞行员668人。⑥上海战事爆发后，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官谷川清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日本海军在中国的作战》(译稿)第153～154页。

②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日本海军在中国的作战》(译稿)第209页。

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1卷1分册第169页。

④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译稿）第220～221页。

⑤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1卷1分册第211页。

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日本海军在中国作战》（译稿）第161页。

中将即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命令所属空军部队“举全力急袭敌航空基地，覆灭敌航空兵力。”随即，日空军除配合地面部队进攻上海，实行战场轰炸外，对我杭州、南昌、南京、武汉、句容、广德等空军基地进行大规模轰炸。从 8月15日起，日机实行“越海轰炸”，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和物资流通要道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实施了被日本海军所形容的“世界空战史上史无前例的大空袭。”①从1937年 7月 7 日中日战争爆发到翌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的 16 个月时间里，仅海军航空部队参战的飞机约有10000架次，使用炸弹约3.5万颗，重量约3000吨，对地面扫射耗费了约32万发机枪子弹。②其中，对南京的轰炸最为残酷。1937年 9月19日，海军舰队司令官下达空袭南京的命令：“对南京的军事、政治、经济诸机关，实施制空权的轰炸。”并指示“：轰炸无须直接命中目标，重点在于使敌方人心感到恐怖。”③这样，日军把中心城市轰炸作为了重点作战目标。 1937年 9～10月的1个月间，仅海军航空部队对南京、广州进行的轰炸就共投弹4950颗，其中绝大部分是60、80、120公斤重的炸弹。④南京市街几乎夷为平地，市民的生命财产和非军事设施遭到严重的破坏。对此，日本学者前田哲男指出：“这一系列的轰炸中，飞机出击架次、投弹量、机动距离，其规模和残忍程度都刷新了世界航空战史上的记录。’⑤

日军对我国中心城市和和平居民的野蛮轰炸得到日本最高统帅部的大力支持和嘉奖。1937年11月10 日，天皇敕令嘉奖海军第

①〔日〕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中译本)第32页。
②〔日〕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中译本）第31～32页。
③〔日〕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中译本）第31～32页。
④〔日〕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中译本）第31～32页。
⑤〔日〕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中译本）第31～32页。

三舰队司令长官：“协同陆军击败上海方面之敌，进而长驱直入敌要地，击毁敌机，摧毁敌诸阵营，切断交通，扬皇军之威于中外，特此嘉奖将士之忠勇。”①同月中旬，日本陆军部颁布的《陆军航空部队使用法》中明确规定，陆军航空部队也从支援地面作战转向进攻要地的空中轰炸，以破坏我国的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甚至规定：“直接空袭市民，给敌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②这表明：日本最高当局已确定了把我国战略、政略要地，即政治、军事、经济中心作为轰炸目标的“战略轰炸”思想。

武汉作战期间，日军大本营下达《169号大陆令》，改编了侵华航空部队，把陆军“临时航空兵团”改为“航空兵团”，实行空地分离制，确立航空兵独立使用，“以便飞行战斗队更自如地运用”；并把航空兵团的配制由华北转入华中，编入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在南京设司令部指挥所；将华北方面飞行队编入华北方面军战斗序列。1938年8月，航空兵团迅速向华中基地集中，和海军航空部队共同参加了武汉空战。10月，日军占领了武汉、广州后，其地面进攻锐气大减，日军决定：“今后除以空军进行作战外，不谋求大规模作战。”③华中方面派遣军认为：“以空军不断消耗敌兵力，挫败其士气，也是促使蒋政权崩溃不可或缺的行动。”④10月底，日军大本营就对中国内地进行战略轰炸问题与华中派遣军进行了磋商，决定改变航空部队的作战方针，把作战重点转向对

① 〔日〕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中译本）第38页。

② 〔日〕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中译本)第38页。

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2分册第53、54页。

④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2分册第53、54页。

中国内地重要城市的战略轰炸，企图利用其空中优势，大施空军淫威，“单用空军获得决定性成果”，以配合政治上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通过威胁与引诱相结合的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

〔日本天皇命令实施政略轰炸〕

1938年12月2日,根据日本天皇‘大陆令第241号令”，日军大本营向侵华日军下达345号大陆作战令，即《陆海军中央航空协定》，把航空作战放到了首位。要求航空部队集中兵力，投入优良的飞机“攻击敌战略及政略中枢”，并指示“对中国各军可使用特种弹(毒气弹——笔者注)。’①《协定》规定‘‘陆军航空部队以航空兵团为主，对华北、华中要地进行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海军航空部队主要担任对华中、华南要地的战略、政略的航空作战”，根据情况，必要时陆海军航空兵可相互增援。四川被列入“华中方面”，成为日军航空作战的重点，重庆成为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

华中方面的兵力部署是：

陆军：

飞行第五十九战队（战斗机20架）；

飞行第十二战队（战斗机15架）。

航空兵团：

第一飞行团（侦察机18架、战斗机12架、重型轰炸机45架）；

第三飞行团（侦察机9架、战斗机24架、轻型轰炸机45架）。

海军：

第二联合航空队（舰载机54架、舰攻机24架、舰轰机12架、中攻机26架）；

① 〔日〕前田哲男：《重庆大轰炸》(中译本)第59页

第一联合航空队（中攻机24架）；

第三航空战队（水上侦察机24架）。①

尽管以后部队和兵力都作过调整，但上述兵力是进行大轰炸的主力。

为了实施对内地的轰炸计划，日军占领武汉后，迅速将陆海军航空部队集中到武汉。1938年11月15日，航空兵团命令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少将——笔者注）在5周内初步完成远距离航空攻击战的训练，7周内结束训练。同时，开始赶修武汉及华北的运城、彰德、包头等向内地进攻的基地。在武汉，把原万国赛马场、华商赛马场改建为宽大的机场，以“W基地”作代号，可以容纳200余架飞机。这是以后几年间陆海军航空部队轰炸重庆的主要基地。

1938年12月9日，华中派遣军指示航空兵团：“以主力和海军密切配合……在压制战略及政略中枢的同时，特别要消灭敌人的航空战斗能力。”同月中旬，航空兵团派出侦察中队侦察了重庆和兰州。同月24日，下令第一飞行团准备轰炸重庆，第三飞行团准备策应这一作战。

正当日本军方加紧部署对大后方的战略轰炸的时候，日本对国民党当局的诱降分化活动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贯主张妥协投降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在日本政府第二次“近卫声明”发表后，其代表与日本在上海秘密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等卖国协议，并决定叛逃投敌。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逃离重庆，飞往昆明，翌日逃往越南河内；22日，日本政府根据协定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公开抛出了招降条件；29日，

①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2分册第71～72页。

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叛国投敌；为配合其卖国行动，30日,汪精卫还向日本主子提出四点‘希望”。其中丧心病狂地提出：“为在政治上收到效果，希望日军对北海、长沙、南昌、潼关实行作战行动。对重庆可实施以致命的轰炸。”①日本当局也认为汪精卫的叛逃会引起大后方人心混乱，中国政府将会发生动摇，主和派势力将会抬头，甚至在西南可能会出现追随汪精卫而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局面。因此，此时是对重庆进行轰炸，以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的绝好机会。遂决定立即实施对重庆的战略轰炸。

1938年12月25日，日军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下达命令：“攻击重庆市街，震撼敌政权。”次日，日机轰炸重庆。自此开始，在以后的3年间，日机对重庆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中枢机关以及市街、学校、商店、居民住宅等进行了长时间无区别的狂轰滥炸。陪都重庆，这座后方都市饱受了战火的摧残，重庆人民经受了现代战争的血与火的熬煎。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2分册第148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